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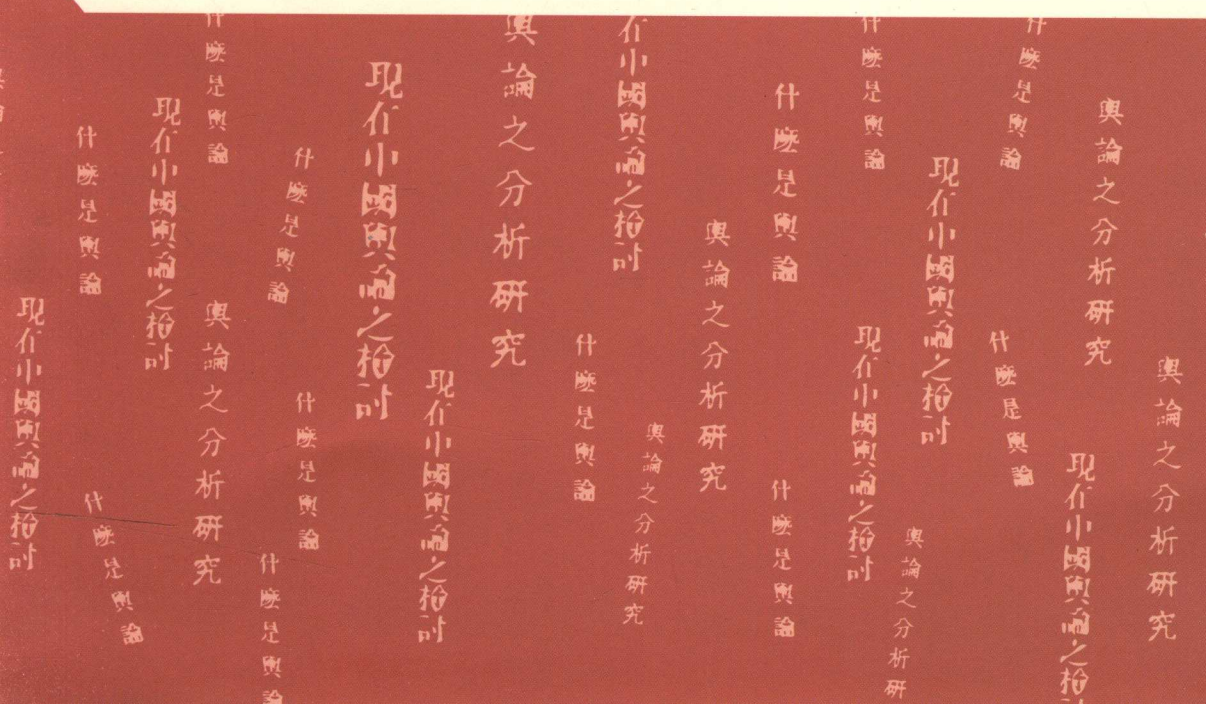
近现代中国舆论研究 文献选编

Public Opinion Study Selections in Modern China

倪琳 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60032)

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商务传播学”资助 (J52001)



近现代中国舆论研究 文献选编

Public Opinion Study Selections in Modern China

倪琳编

内容提要

本书选录了 1840 年至 1949 年期间,公开发表的以舆论为思考和研究对象的文献资料 50 篇。这些舆论文献体裁丰富,观点各异:既有清末民初的文言文,也有民国中后期的白话文;既有名家的政论式文章,也有知名学者的学术性文章;既有主编与记者的思考性文章,也有社会知名人士的演讲,等等。文献根据发表时间顺序编排,读者从中可发现舆论思想变迁的基本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清末民初时期的舆论思想;民国建设时期的舆论思想;战争时期的舆论思想。每个不同阶段的时代任务决定舆论思想诉求重点。基于这些文献,读者还可从传统舆论思想资源、西方舆论思想资源、本土舆论实践及其思想形成三个角度来做进一步解读,从更深层次的文化遗产、碰撞、融合中考察中国现代舆论思想变迁过程的多个向面。

本书适合对新闻传播学、舆论学、传播思想感兴趣的读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现代中国舆论研究文献选编/倪琳编.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313-13032-7

I. ①近… II. ①倪… III. ①舆论—文献—中国—近现代 IV. ①C91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1202 号

近现代中国舆论研究文献选编

编 者:倪 琳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制: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787 mm×1092 mm 1/16

字 数:346 千字

版 次:2015 年 6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78-7-313-13032-7/C

定 价:60.00 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20.75

印 次: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57602918

前 言

本书所收录的近现代舆论思想研究文献资料来源于对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特藏馆所保管的期刊报纸的缩微胶卷中,以舆论为论述对象与研究对象的文章进行检索、查阅而得。通过文献数据库中的语词使用的频率次数进行统计,整体上首先可以发现的是,现代中国将“舆论”替代古代中国专门指称言论批评或建言评说的“清议”从 1898 年这个现代中国思想史的转折点开始,其使用就一直高居不下,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使用更为频繁与集中,成为现代中国人指称言论表达、意见评说的日常性专有名词。而与“舆论”相比,20 世纪以降“清议”概念则基本上淡出人们使用的视野而被完全边缘化。“舆论”将“清议”替代,不仅是语言上的替代,同时也是一种思想上的突破。舆论观念的兴起与清议淡出的现象总体上可以解释为:在中国传统框架下的清议概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舆论这个更平民、更底层、适用范围更广的概念所代替,实质上完成了以平民大众为利益表达主体,尊重多数人意见的具有现代化意味的演变。

通过对收集到的舆论思想档案文献按照时间顺序依次统计还发现,对于舆论现象与舆论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以 1920 年为拐点呈现出显著变化。在 1918 年之前,除 1910~1914 年间有一个小高潮,其他时间对舆论问题的关注非常之少,即便关注也是将舆论看作民众的一种政治觉醒,对利用舆论力量改进政治持有热情的乐观思想。而在 1918 年以后,伴随着 1919 年新文化运动开展对舆论问题开始有反思倾向,特别是 30 年代以后,进入了近

代中国对舆论讨论最为深入与广泛的时期,并在1934年达到了最高峰,总计至少发表了22篇对舆论问题的研究与讨论的文章,之后的1935~1937年连续三年平均每年至少有15篇文章。1937年之后,由于抗日战争的正式爆发,对舆论问题的讨论与思考有所回落,并且开始强调战时舆论统制一律的特点。即便如此,从1937到1945年间,对舆论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因为战争动乱而大幅减弱甚至消失,而是仍然保持一定的篇幅数量,直到1949年仍然如此,每年都会出现有关对舆论问题的讨论。总而言之,从1918年以后,近现代中国知识各界对舆论问题的多向面的讨论与研究从未间断过。可以说,近现代有识人士对该问题长期保持兴趣,而这种兴趣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些被现代科技保存流传下来的对舆论进行论述与思考的文章,经过时间的冲刷与沉淀,已经渐渐成为国人头脑中一幅有关对舆论理解与想象的图画,尽管这幅图画有些凌乱、模糊与庞杂,但又充满生机地散发一种时代印迹雕刻下的思想光芒。即使用生硬的时代刻度将这些思想的片断进行组合与划分,同样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感受到现代中国对舆论思考的力度与方向。第一个时代刻度为清末民初,这段时期是近代中国剧烈变动的时期,触动了传统社会的每根神经,击破中国社会的原有结构,有甲午战败的忧愤,庚子赔款的耻辱,有维新派的变法,革命派的起义,有清廷的新政与预备立宪,有清廷的逊位与北洋的独裁等,新旧更替、新旧冲突、新旧融合在这段时期有着集中的体现。这种新旧冲突与更替使得舆论思想充满激情与乐观,舆论被赋予一种神圣且神秘的对抗旧恶势力的力量。第二个时代刻度为民国建设时期(20~30年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般被后人评价为是近代中国思想最活跃,最开放,成果最多的时代,是一个不断适应新的世界环境,并作出积极努力与贡献的时期,开启了工业文明的现代化建设。这一时期的舆论思想伴随着新旧断裂,以及商业化的大众报刊传媒的兴起,这时的舆论渐渐退出“革新”的激进色彩,呈现出有关对舆论不仅受到政治的操纵,而且受到金钱的操纵、商业的操纵、多数的暴戾、群体的盲动等负面影响增添了一份忧惧与悲观。第三个时代刻度为战争时期。众所周知,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正在向现代化国家急剧转型的近代中国进行了长达八年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历时之长,所遭之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中国的时代进程,在追求社会重新整合与国家统一富强的政治目标同时,

使得统制舆论与舆论一律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获得合法性与延续性。

徐复观曾言,“任何思想的形成,总要受某一思想形成时所凭借的历史条件之影响。历史的特殊性,即成为某一思想的特殊性。没有这种特殊性,也或许便没有诱发某一思想的动因;而某一思想也将失掉其担当某一时代任务的意义。”^①萧功秦认为,“思想是人类应付环境挑战的大办法。二十世纪的中国人,遭遇到许多与其生存与发展有关的矛盾、困境与疑难问题。中国人在面对它们的过程中,于是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观念、理论、价值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选择与文化选择。这些作为解决之道的思想、主义此起彼伏,相互冲突、碰撞或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了极为丰富复杂的思想发展与变化的思想的历史。”^②纵观近现代中国舆论思想的演进过程(1834~1949年),无不与时代的各种变动,与所遇到的生存困境紧密相连。从最初的舆论主宰论横空出世,一路上从乐观高调转向悲观低迷,再到深入思辨,从舆论自由到舆论统制,最后归入舆论与民主讨论,似乎从起点回到原点,经历了一次轮回。然而,这种舆论思想上的高调与低沉的一起一落,本质上是思想所产生的时代的超前激进与思想所依附的现实的惯性保守相互作用的结果。当然,近现代历史上的每一次舆论思想上的波动与转型也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复杂多变的时局交替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从舆论思想的演进中不可避免地透射出中国国内的“现实环境”与国外的“国际环境”,更为深层的是,各种西方经验之间的取舍对中国舆论思想具有直接的影响力。

然而,将舆论思想用时间强行地划分,是一种简单化地处理方式,并不能更加深入地揭示舆论思想内在演变的特点。因此,我们需要增加更丰富多层次的视角去解读与审视。首先,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传统思想资源对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形成的影响。即便在推翻“旧”的革新时代,传统思想资源还是会发挥其新旧融合的延续功能。对舆论思想方面的延续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尊重舆论的民本思想的复兴。例如,在对创建现代中国舆论思想之初,大多数文章中都会频繁引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舆论”(《梁书》),“防民之

① 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页。

② 萧功秦,思想史的魅力,开放时代,2002年,第1期,第103页。

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国语》),子产不毁乡校,对于众人议论,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左传》),等等,这些体现中国自古已有的尊重舆论的优秀思想传统。对于民本思想,近代中国思想家都推崇备至,从民本思想中发展出民权、民治、民享等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遥相呼应。第二个方面隐藏在激扬的文字背后容易被忽视,即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在舆论思想演变过程中的重构。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注重民意的思想,有进行舆论监督的机构和制度,如“清议传统”、“监察系统”,“谏诤制度”,但这些只是君主专制体制的一种补充,而非一种制衡皇权的独立力量,“定于一尊”的一元传播传统在思想深处继续发挥作用。^① 处于现代转型的中国一旦进入战争的特殊时刻,在面临如何建立富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命题时,对舆论的认识与思考都首要着眼于国家需要、政治需要,将报刊舆论看成是鼓吹革命、统一思想、发挥喉舌功能的政治工具,特别是随着党国体制的一元化建立,与专制传统有着惊人相似之处地形成一套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因此,现代中国舆论思想的演变是一个迂回反复、新旧交织的曲折过程。

其次,西方舆论思想资源的引进与传播。对西方舆论思想资源的引进与传播可分为两个思想阶段:第一,比附的阶段。对于近现代中国在吸收外来异质文化的初始阶段的比附的做法,不少学者颇有微词,认为曲解篡改了西方概念与思想,但比附的做法是一种克服文化冲突的简易且有效的方法。例如,在引入西方民主政治与舆论自由的理念时,《益闻报》的社论提出舆论主宰论,第一次跨越了原有的“君民共治”,“天意”即“民意”交织在一起的思想框架,而是直接将“舆论”推到了最高的权威者的哲学地位,取代统治人民思想数千年的“天”与“君”,将舆论主宰取代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再如,梁启超等一批走在时代前列的维新派吸纳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以及结合民心向背决定政治变革的儒家民本思想,一直有将维新变法的政治理想部分寄托民众舆论觉醒的潜在意味,对大众舆论抱有高度的热情与期望,强调“舆论政治”的民主思想,以及“庶政公诸舆论”的政治维新。再如,林语堂

^① 秦志希,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的若干特性,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37页。

于1936年用英文发表的《中国新闻舆论史》将中国古老的舆论现象与西方现代民主体制联系在一起。书中林语堂虽然尚未经过严密的辨析,沿用同化机制来认知西方异质事物,用古老的概念来“响应”异质事物,诗经、民谣、谏官制度、朝议、奏疏等都被纳入西方舆论思想的范畴,这种思想比附做法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利于人们从情感与理智上双重接受西方式参政议政的民主政治。第二,建构的阶段。在“国民舆论大觉醒”的历史洪流中,伴随着五四时期的到来,中国现代舆论的严谨学理的思考与研究也相继诞生,徐宝璜《舆论之研究》、朱显庄《舆论之分析研究》、叶明勋《舆论的形成》等接受西方学术训练的新派学者将复杂而活跃的社会舆论现象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框架,对社会舆论的正面意义加以肯定的同时,对负面现象进行反思,对舆论的操纵与大众的盲从予以警示,提出健全合理的舆论的理念与方法,标志着中国舆论研究由传统政论风格向现代学术研究范式转变。在这些有关舆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引用的西方理论家及其研究成果,经常出现的著名西方理论家有:法国思想家卢梭、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法国社会心理学家黎朋、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德、美国政治家杰弗逊、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等。中国舆论研究者通过对西方舆论研究成果的引进与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为中国舆论思想的演变铺上理论的色彩,标志着从单纯的政治运动诉求转向了学理建构层面,将新闻学(消息、社论、事实……)、社会学(公众、群体、团体……)、心理学(模仿、暗示、同情……)、政治学(宪政、选举、议会……)中的新概念、新术语,融入舆论思想之中,仿效西方的知识谱系与话语方式,给舆论思想提供了全新的知识条件与概念养料,以现代专业化的知识形式,初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系统的舆论思想框架,使舆论概念及其相关思想内容纳入跨学科融合发展之中,从而使得单一政治取向浓烈的舆论思想变得更加多元与丰富,侧重于学理逻辑上对“舆论”进行解读与思考,淡化舆论思想中的动员民众的政治功能,扩充舆论的社会内涵,某种程度上为舆论权力获得了一定政治上的安全性,成为现代中国舆论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例如,舆论的多数意见与少数意见之辩,舆论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广义的舆论与狭义的舆论,社会心理的暗示、模仿、价值观对舆论的影响,舆论的煽动与操纵,资本与权力对舆论的控制等,这些均可在收录的第二个时代刻度为民国建设时期(20~30

年代)的文章中找到思想的碰撞。

对于舆论思想形成的第三个视角来自舆论的实践。这是因为舆论思想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产生于人们的舆论实践的过程之中,是舆论现象与舆论实践的能动反映。舆论思想有时会超前于舆论实践,有时会滞后于舆论实践,但两者是相辅相成,彼此依赖的。现代舆论思想兴起的最重要的时代背景是大众报刊与大众传播的兴起,这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与思考舆论的重要实践平台。相较于所谓读诏令奏章“邸报”的官报与朝堂之争的清议清流,大众报刊这种传播方式与机构的兴起使现代中国意识到大众传播工具在制造舆论、引导舆论上的威力。正如《中国之新闻与舆论》中有诗为证这种报刊与舆论的关系:“欲齐众志障狂澜,言路忽开于报端,冷露西风欢比竹,此间从不道平安!”不难发现,诸多文章都将近现代重大的政治事件都归于舆论的向背——“清室的所以能亡,袁世凯的所以能倒,段祺瑞的所以能败,都是舆论的力”。张灏将大众报刊与学校、学会称为一种制度性传播媒介,有助于传统士大夫在向现代专业知识人转变。^① 戈公振认为,从1895年以后,从事报刊活动即非之前的亦官亦商或亦绅亦商的官僚买办类的人物,也非落魄的失意文人,而是“声光炳然的魁儒硕士”。^② 正是大量的从儒士向现代专业人才转型的有才华有抱负的新兴一代投入大众报刊与舆论的事业之中,并通过不断的报刊舆论实践对中国舆论现象发表各自的观察与看法,成为现代中国舆论思想的构成部分。例如,梁启超通过早期对舆论与报刊的观察,提出的报刊与舆论的三种关系:“敌”、“母”、“仆”,即“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后根据多年的办报实践经验,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中,对媒体从业人士与舆论传播进行反思,第一次系统完整的提出健全之舆论的“五本八德”,指出“俗论妄论之误国人”,从最初的全盘肯定舆论到对舆论做出的合理限定,即健全之舆论,提出“故非舆论之可贵,而其健全之为可贵。健全之舆论,无论何种政体,皆所不可缺。”再如,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职业报人胡政之,经过多年的

①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收录于思想与学术,陈弱水,王汎森主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305页。

②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插图整理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

报刊媒体实践,竟然提出一个巨大的疑问“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他不仅认为中国没有舆论,而且对中国的舆论现象持否定态度,他写道“社会上只有‘乡愿’,只有‘愚论’,而不能有健全合理的真舆论”。从一向标榜“舆论之母”的报刊媒体人的笔下写出如此“冰冷悲观”的观点,的确会让人产生一种思想上的震惊感,但也有相当大的思想影响力,当时就掀起一场“中国舆论大辩论”,如吴景超、陶孟和、方秋苇等都对“中国舆论”“有或无”、“发达或落后”进行回应。这些笔耕不辍,作出历史贡献的报刊媒体前辈对舆论的观察与观点,往往可以使我们更能感受舆论的复杂多变,反复无常,从而加深对舆论的了解。正如当今美国新闻界对舆论的观察,“媒体可以设置人们讨论什么议题,但不可以设置人们对这个议题的看法。媒体有设置公共议题的功能,但公共议题经过大众传播之后,舆论的发展方向往往就不受媒体控制的了”。^① 媒体可以制造舆论,但无法控制舆论未来的走向,这种大众情绪与观点的“不可预测”与“难以改变”,使得早期具有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媒体人产生一种“无力无奈”感。

本书选录的50篇文献按发表时间的顺序排列,读者大致也可感受到舆论思想变迁的基本脉络,并可从传统舆论思想资源、西方舆论思想资源、本土舆论实践及其思想形成三个角度来作进一步的解读,感受中国现代舆论思想的多个向面。所选录的50篇舆论文献体裁丰富,观点各异,既有清末民初的文言文,也有民国中后期的白话文,既有名家的政论式文章,如梁启超的《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张佛泉《我们为什么要说长道短?》,也有知名学者的学术性文章,如徐宝璜《舆论的研究》、刘国桢《舆论与社会》、曾虚白《报纸与政治》、叶明勋《舆论的形成》、朱显庄《舆论之分析研究》;既有报刊主编与记者的思考性文章,如罗家伦《舆论的建设》、杜亚泉《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胡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等,也有社会知名人士的演讲,如高尚德《大学与舆论》、梁士纯《战时的舆论及统制》等,还有对一些与中国舆论相关的外国学者的译文,如樊仲云等翻译的日本学者长谷川如是闲《舆论与新闻》、李季烈翻译日本记者评论文章《中国之新闻与舆论》、李友珊部分

① McCombs, M. E., Emsiedel, E. F., & Weaver, D. H. (1991). *Contemporary public opinion: Issues and the news*. Lawrence Erlbaum Assoc Inc. p7-9.

翻译的美国外交官贝兹对中国的舆论观察与思考《中国的舆论》等。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有些文章之间的观点,矛盾冲突也很鲜明,但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特色,不同观点与思想可供读者批判性解读。对本书选文的不少观点与提法,编者不能苟同,但为保持选文的文献特色和历史感,便于读者阅读参考,本书选编时基本保持原样。

由于本人学识与能力有限,对书中存在的差误与疏漏,敬请海内外专家、读者朋友见谅赐教。



目 录

舆论明证主宰说	益闻报(作者不详) (1)
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	梁启超 (3)
《国风报》叙例	梁启超 (5)
舆论正义	金其堡 (9)
舆论与法律	陶保霖 (18)
社会与舆论	汪馥炎 (20)
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	高 劳 (28)
今日中国舆论之堕落	刘慎德 (32)
舆论与煽动	执 信 (36)
民意	景 藏 (40)
舆论的建设	罗家伦 (43)
舆论之研究	徐宝璜 (46)
大学与舆论	高尚德 (50)
舆论与社会	刘国桢 (53)
舆论	亦 乐 (63)
中国之新闻与舆论	采菊诗屋主人(李季烈译) (72)
舆论与社会	邵力子 (77)
舆论的意义及其与民治的关系	端木恺 (84)
舆论与新闻——社会意识之表现形态	长谷川如是闲(樊仲云译) (94)
舆论	君 达 (110)
舆论的社会性与反社会性	长谷川如是闲(李立侠译) (112)

舆论之分析研究	朱显庄 (119)
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	胡政之 (130)
舆论在中国何以不发达?	吴景超 (135)
现在中国舆论之检讨	方秋苇 (138)
报纸与政治	曾虚白 (144)
关于中国的新闻纸	陶孟和 (148)
什么是舆论	蒋绍炎 (153)
报纸评论和社会舆论	潘君健 (160)
报业公营与制造舆论	杨 季 (165)
舆论之改造	吴贯因 (176)
作报与看报	胡政之 (182)
报纸与舆论	爱 卢 (189)
从言论自由说到新闻统制	程 文 (195)
《中国新闻舆论史》前言	林语堂(刘小磊 译) (204)
“舆论自由”果可能乎	撒尔德(译者不详) (217)
“舆论”究竟是什么	陈固廷 (221)
关于舆论的本质与新闻政策之考察	张致中 (227)
战时舆论与政治	曹立瀛 (232)
战时的舆论及统制	梁士纯 (242)
我们为什么要说长道短?	张佛泉 (252)
统制舆论与广开言路	赵其湘 (255)
舆论的形成	叶明勋 (258)
民主政体下之舆论的力量及其限度	黄炳坤 (275)
中国的舆论(未完)	贝 兹(李友珊 译) (279)
领导舆论与限制舆论	王一之 (290)
舆论之社会心理学观	陈定閔 (298)
宪政与舆论	张知本 (302)
清议辨	侯外庐 (305)
中国舆论史概述	彭思衍 (307)



舆论明证主宰说^①

古圣王受命有天下,问俗采风而外,又复听乡议于庶人,故周礼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致万民而询之,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可知舆论之翊辅谋猷,资益图画,于国事非无小补焉,特是政令之得失,未必询谋佥同,而主宰之有无,则遐迩绝无异议。凡人生富贵,人必羨之曰,斯人之命福命也;生而贫贱,人必悯之曰,斯人之命苦命也。处事迎祥,行商获利,谓之美运。死亡疾病,灾害频仍,谓之恶运。夫命也者,赋畀之谓也。运也者,轮值之谓也。有赋畀即有赋畀之权衡,有轮值即有轮值之大造,是纵言命运而主宰之义已明矣。愚尝游行吴楚,间历乡隅,见豆棚瓜架间,狭巷通衢中,往往有村翁灶妪,牧竖樵夫,示之以之无而不识也,授之以经传而不知也,间之以礼乐,课之以文章,而亦茫茫昧昧,不知所答也。至其聚谈乡曲,闲话衷情,则相告曰,某也被冤若是,天必申佑于一朝,某也强悍若是,天必降罚于他日。言其立身之困,则曰靠天活命;言其处境之穷,则曰听天行事。见人之善,则助之曰,人无眼而天实有眼,子其勉之。见人之恶,则责之曰,人可欺而天不可欺,子其戒之,甚至扰袂唏嘘,元良感触。凡其行动话言,无一不引天为证,所谓天者,乃洋洋在上之神,赫赫当前之鉴,所谓主宰者是也。说者谓习俗移人,牢不可破,吾中国向有郊天敬天之举,愚民耳濡目染,习以为常,故其启齿,必呼天自誓,此非不易之定评,亦何足执为依据,殊不知此等论说,无时蔑有。数千百年前,泰西政教未开,世风未化,当是时,惟犹太一邦,独得道统,而其余人民,或敬牛马,或敬草木,或敬水火气土,或敬日月星辰,种种

^① 益闻报,1882年,第142期,无页码。

荒谬,笔难罄述,而千形万象之中,必有一至尊极大之神,以为统摄群生之元宰,则主宰之说,脍炙人口,千古原无二致。今天下生从之繁,千数百兆,疆土之分,数百余国,其间教化、文字、言语、衣服、政令、习尚、气体,各不相同,而其奉敬主宰之意,则万民若合一辙,故蠢如黑蛮,愚如粗鲁,陋如非洲内地之人,浑浑噩噩,几不知伦理纲常之事,而祭祀之礼隆焉,祷告之文尚焉,祈谷求雨之义行焉,无他,此心此理,天下皆同。而舆论之证主宰,其凿凿可凭有如此。



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①

梁启超

凡欲为国民有所尽力者，苟反抗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

虽然，舆论之所在，未必为公益之所在。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而世界贵有豪杰，贵其能见寻常人所不及见，行寻常人所不敢行也。然则豪杰与舆论常不相容，若是豪杰不其殆乎？然古今尔许之豪杰，能烂然留功名于历史上者踵相接，则何以故？赫胥黎尝论格兰斯顿曰：“格公诚欧洲最大智力之人，虽然，公不过从国民多数之意见，利用舆论以展其智力而已。”

约翰·摩礼（英国自由党名士，格公生平第一亲交也）驳之曰：“不然。格公者，非舆论之仆，而舆论之母也。格公常言：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时势之真相，唤起应时之舆论而指导之，以实行我政策。此实格公一生立功成业之不二法门也，盖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舆论，其事事假借舆论之力，固不诬也。但其所假之舆论，即其所创造者而已。”

饮冰子曰：谓格公为舆论之母也可，谓格公为舆论之仆也亦可。彼其造舆论也，非有所私利也，为国民而已。苟非以此心为鹄，则舆论必不能造成。彼母之所以能母其子者，以其有母之真爱存也。母之真爱其子也，恒愿以身为子之仆。惟其尽为仆之义务，故能享为母之利权。二者相应，不容假借，豪杰之成功，岂有侥幸耶？

古来之豪杰有二种：其一，以己身为牺牲，以图人民之利益者；其二，以人民

① 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第89—90页。

为刍狗,以遂一己之功名者。虽然,乙种之豪杰,非豪杰而民贼也。二十世纪以后,此种虎皮蒙马之豪杰,行将绝迹于天壤。故世界愈文明,则豪杰与舆论愈不能相离。然则欲为豪杰者如之何?曰: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敌舆论者,破坏时代之事业也;母舆论者,过渡时代之事业也;仆舆论者,成立时代之事业也。非大勇不能为敌,非大智不能为母,非大仁不能为仆,具此三德,斯为完人。